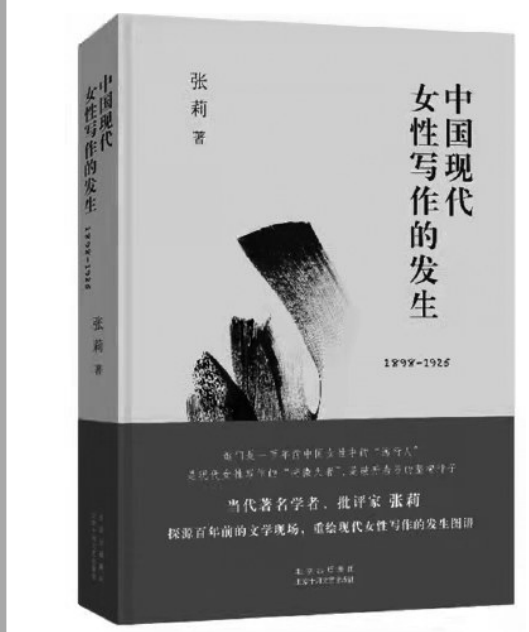


编者按

如今,女性写作已成常态。但在百年前,写作对女性来说却并非易事。她们要突破“女性不能写作”的世俗偏见,要争取写作的时间和物质条件,还要面临男性作家的贬低和否定……在百年前的中国,女性写作是如何发生的?如今的女性写作发生了哪些变化?对国外的女性写作者来说,她们又是如何在种种抑止女性写作的氛围中突破重围坚持写下去的?中外女性写作的处境有什么异同?本期《新阅读》专刊推出“女性写作”专题,探究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以及变化,分析抑止女性写作的机制,鼓励女性理性平和地看待女性写作的传统,寻求“彼此相连的感觉”。

书人苑

张莉: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黄婷

如何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与西方女性文学区分开来,是不少学者致力探究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1898-1925)》一书中,张莉将中国现代早期的女性文学定义为女学生文学,为该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她努力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观照中国女性文学自身生长的语境,寻找属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自身传统。

在回到中国历史语境里寻找女性文学发生的背景之外,张莉也关注当代女性文学写作,并提出了“新女性写作”的概念,主编了《2019/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和《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等作品集。在这些女性年选里,我们不仅能看到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也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生活状态的重大变化。而“新女性写作”的概念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希望作品将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

在张莉看来,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而不是对抗与排斥。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回到中国历史语境里寻找女性文学发生的背景

女报《新阅读》:您当初是在什么缘由下关注到女学生文学,并从这个角度研究现代女性写作的?

张莉:那已经是二十年前了,我还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一年级,第一次读到戴锦华、孟悦老师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这本书对我有很

事实上,这是拉斯对于男权社会抑止女性写作模式的高度概括。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拉斯用她熟悉的科幻文学情景打开了一段隐匿的历史——男性通过种种策略,阻止、无视并贬低女性的文学写作。在这本反讽意味十足的文学评论中,拉斯戏仿男性口吻,点破了历史上贬损女性作家的惯用潜台词。同时,尖锐的讽刺并未使拉斯失却客观,每一条抑止女性写作的机制分析都有历史文献、文学文本佐证。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的《如何抑止女性写作》(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版)以“格罗托罗格”这个词开始。她解释道,该词为星际用语,代指“可笑的自我欺骗”,也用以形容“不需要经过直接审查就能做到的信息控制”。

于是,非正式禁令成了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一面剥夺女性创作的可能,一面却又借此宣称她们没有能力创作:“这种让女人不要当创作的啥呀?”……尖锐的讽刺并未使拉斯失却客观,每一条抑止女性写作的机制分析都有扎实的历史文献、文学文本佐证。这是一本面向男性中心文学史的批判檄文,也是对整个女性文学传统难能可贵的补白。

针对女性写作的“非正式禁令”

在分析抑止女性写作的策略之前,拉斯首先揭示了这些策略的隐性特质:强势的男性当然不会颁布明确的法令禁止女性写作,但“非正式禁令”却处处存在,成为司空见惯的权利剥夺。

女性写作者被赋予的“假性自由”与真实阻力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稍稍熟悉唯物史观的人都知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伴随着父权制的大获全胜,开启了男性在政治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女性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被彻底“他者”化,不掌握财产权,不从事社会生产,也自然不可能具备文学创作所需的物质基础与自由空间。

书中,拉斯援引文学史资料呈现了女性创作者打破禁令的艰难。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女性,都很难有可支配的金钱和闲暇时间:艾米莉·狄金森身无分文,需要向父亲讨要购买书籍的钱;乔治·艾略特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她得料理家务,照顾生命垂危的父亲;工人阶级女作家蒂莉·奥尔森则需要面对一天工作十五小时的干扰……

物质与闲暇的缺失之外,男权社会从意识形态上将女性排挤出文学创作活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本就在20世纪才逐步获得,而“劝阻女性求知”的顽固意识,不断否决着女性写作的正当性,摧毁着女性创作者的信心。

于是,非正式禁令成了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一面剥夺女性创作的可能,一面却又借此宣称她们没有能力创作:“这种让女人不要当创作的啥呀?”……尖锐的讽刺并未使拉斯失却客观,每一条抑止女性写作的机制分析都有扎实的历史文献、文学文本佐证。这是一本面向男性中心文学史的批判檄文,也是对整个女性文学传统难能可贵的补白。

二元对立等式的诸种面孔

面对男性自以为是的“她没有写”的论断,拉斯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驳。的确,女性在狭小艰难的空间中依旧创造出了相当优秀的文学作品,男性便只能转而贬低它们的价值。“剥夺作者身份”“诋毁作者”“内容的双重标准”等都是价值贬损的不同策略。如果我们对拉斯的分析略加思考,便不难发现,这些策略中贯穿着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等式,人与文学创作的特性被归为高低有别的两类,而女性总与劣等的特性相勾连。

“剥夺作者身份”的策略有时将女性作家的作品归功于她的兄弟或身边的其他男性,有时则呈现为隐性剥夺,即认为是“她身体里的那个男人在写作”。“内容的双重标准”更是一连串二元对立的分配,男性将女性逐出公共领域,而后将私人领域定义为琐细的、毫无价值的。于是女性写作也等于狭隘的,等于地方主义的,等于不严肃的……

在高下两分的对立体系内,女性写作本身成了对男性特权的冒犯,这使得价值低俗常常演化为诋毁。拉斯谈到,19世纪的欧洲几乎将成功写作的女性等同于道德败坏,到了20世纪,关于女性的道德约束有所松动,但擅长写作的女性又与“缺乏女人味”“不招人喜欢”画上了等号。“女性的智识是要以失去可爱的女性的特征为代价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海伦妮·多伊奇如是说。

“她们”彼此相连

“如果关于前辈的记忆被埋葬,那么过去从



者的日常生

己的日常生活,也能关注重要的社会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女性写作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北上广的女性,但其实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这些年,我一直关注边地女性的写作,关注那些少数民族女性的写作。我喜欢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和冯良的《西南边》,喜欢她们书写的女性生活,那是我们不常了解、但是却应该了解的女性生活。关注边地女性,关注我们时代女性生活中的重要变化,我认为是当代女性写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

女报《新阅读》:女性写作如何平衡更能体现女性自身立场的个体经验和更关注充满男性评价标准的社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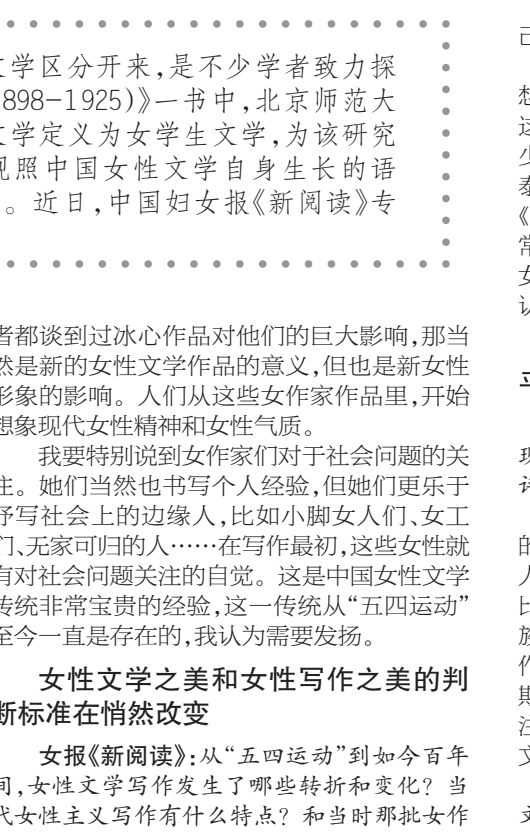
张莉:优秀女性文学作品要有对个体经验的书写挖掘,同时也要有关社会问题、关注他人的方向,这些向度可以同时存在,并不相悖。比如,《生死场》里有个人生命经验,但也有对民族危亡时刻的书写。最近那些受到关注的国外作品,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证言》《那不勒斯四部曲》,既有个人经验,也有社会问题的关注。题材固然重要,但作家的表现力也很重要,文学作品最终要看写得好不好。

女报《新阅读》:您也一直关注着当代女性文学写作,并提出了“新女性写作”的概念,主编了《2019/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等作品集。新女性写作与以往的女性写作新在哪里?

张莉:去年,我开始编选《2019年女性文学年选》,今年是第二年了。这是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尝试。这个年选,每年选出20位女作家写的20个当代女性故事。我希望这些年选排列在一起,既是女性文学的文本,也是一个社会学和妇女研究样本,我们从这里不仅看到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也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生活状态的重大变化。

《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收入了翟永明、林白等13位各个代际、但都深具性别意识的重要女作家的作品。我希望以此推动对“女性写作”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之所以提“新女性写作”这个概念,是想强调今天的“女性写作”与以往的有所不同。它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希望作品将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希望作家对两性关系、男人与女人以及性别意识有深刻认知。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而不是对抗与排斥,我希望以写作专辑的方式来推动一种新的女性写作出现。

张莉:我们很难出现一部全民关注的女性小说或者女性非虚构作品了。一方面今天我们是视觉媒体的时代,文学影响力变小了。另一方面也因为,今天的作家可能对当下的生活没有那么敏感了。今年我组织了一个写作专辑,“非虚构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女性劳动者”,我希望那些大众媒体并不熟悉的女性生活出现在写作者笔下,我想那是当代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的发展方向。特别期待青年一代作家既关注自



己的日常生

己的日常生活,也能关注重要的社会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女性写作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北上广的女性,但其实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这些年,我一直关注边地女性的写作,关注那些少数民族女性的写作。我喜欢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和冯良的《西南边》,喜欢她们书写的女性生活,那是我们不常了解、但是却应该了解的女性生活。关注边地女性,关注我们时代女性生活中的重要变化,我认为是当代女性写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

女报《新阅读》:女性写作如何平衡更能体现女性自身立场的个体经验和更关注充满男性评价标准的社会问题?

张莉:优秀女性文学作品要有对个体经验的书写挖掘,同时也要有关社会问题、关注他人的方向,这些向度可以同时存在,并不相悖。比如,《生死场》里有个人生命经验,但也有对民族危亡时刻的书写。最近那些受到关注的国外作品,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证言》《那不勒斯四部曲》,既有个人经验,也有社会问题的关注。题材固然重要,但作家的表现力也很重要,文学作品最终要看写得好不好。

女报《新阅读》:您也一直关注着当代女性文学写作,并提出了“新女性写作”的概念,主编了《2019/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等作品集。新女性写作与以往的女性写作新在哪里?

张莉:去年,我开始编选《2019年女性文学年选》,今年是第二年了。这是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尝试。这个年选,每年选出20位女作家写的20个当代女性故事。我希望这些年选排列在一起,既是女性文学的文本,也是一个社会学和妇女研究样本,我们从这里不仅看到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也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生活状态的重大变化。

《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收入了翟永明、林白等13位各个代际、但都深具性别意识的重要女作家的作品。我希望以此推动对“女性写作”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之所以提“新女性写作”这个概念,是想强调今天的“女性写作”与以往的有所不同。它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希望作品将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希望作家对两性关系、男人与女人以及性别意识有深刻认知。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而不是对抗与排斥,我希望以写作专辑的方式来推动一种新的女性写作出现。

张莉:我们很难出现一部全民关注的女性小说或者女性非虚构作品了。一方面今天我们是视觉媒体的时代,文学影响力变小了。另一方面也因为,今天的作家可能对当下的生活没有那么敏感了。今年我组织了一个写作专辑,“非虚构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女性劳动者”,我希望那些大众媒体并不熟悉的女性生活出现在写作者笔下,我想那是当代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的发展方向。特别期待青年一代作家既关注自



己的日常生

己的日常生活,也能关注重要的社会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女性写作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北上广的女性,但其实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这些年,我一直关注边地女性的写作,关注那些少数民族女性的写作。我喜欢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和冯良的《西南边》,喜欢她们书写的女性生活,那是我们不常了解、但是却应该了解的女性生活。关注边地女性,关注我们时代女性生活中的重要变化,我认为是当代女性写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

女报《新阅读》:女性写作如何平衡更能体现女性自身立场的个体经验和更关注充满男性评价标准的社会问题?

张莉:优秀女性文学作品要有对个体经验的书写挖掘,同时也要有关社会问题、关注他人的方向,这些向度可以同时存在,并不相悖。比如,《生死场》里有个人生命经验,但也有对民族危亡时刻的书写。最近那些受到关注的国外作品,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证言》《那不勒斯四部曲》,既有个人经验,也有社会问题的关注。题材固然重要,但作家的表现力也很重要,文学作品最终要看写得好不好。

女报《新阅读》:您也一直关注着当代女性文学写作,并提出了“新女性写作”的概念,主编了《2019/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等作品集。新女性写作与以往的女性写作新在哪里?

张莉:去年,我开始编选《2019年女性文学年选》,今年是第二年了。这是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尝试。这个年选,每年选出20位女作家写的20个当代女性故事。我希望这些年选排列在一起,既是女性文学的文本,也是一个社会学和妇女研究样本,我们从这里不仅看到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也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生活状态的重大变化。

《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收入了翟永明、林白等13位各个代际、但都深具性别意识的重要女作家的作品。我希望以此推动对“女性写作”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之所以提“新女性写作”这个概念,是想强调今天的“女性写作”与以往的有所不同。它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希望作品将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希望作家对两性关系、男人与女人以及性别意识有深刻认知。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而不是对抗与排斥,我希望以写作专辑的方式来推动一种新的女性写作出现。

张莉:我们很难出现一部全民关注的女性小说或者女性非虚构作品了。一方面今天我们是视觉媒体的时代,文学影响力变小了。另一方面也因为,今天的作家可能对当下的生活没有那么敏感了。今年我组织了一个写作专辑,“非虚构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女性劳动者”,我希望那些大众媒体并不熟悉的女性生活出现在写作者笔下,我想那是当代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的发展方向。特别期待青年一代作家既关注自



己的日常生

己的日常生活,也能关注重要的社会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女性写作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北上广的女性,但其实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这些年,我一直关注边地女性的写作,关注那些少数民族女性的写作。我喜欢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和冯良的《西南边》,喜欢她们书写的女性生活,那是我们不常了解、但是却应该了解的女性生活。关注边地女性,关注我们时代女性生活中的重要变化,我认为是当代女性写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

女报《新阅读》:女性写作如何平衡更能体现女性自身立场的个体经验和更关注充满男性评价标准的社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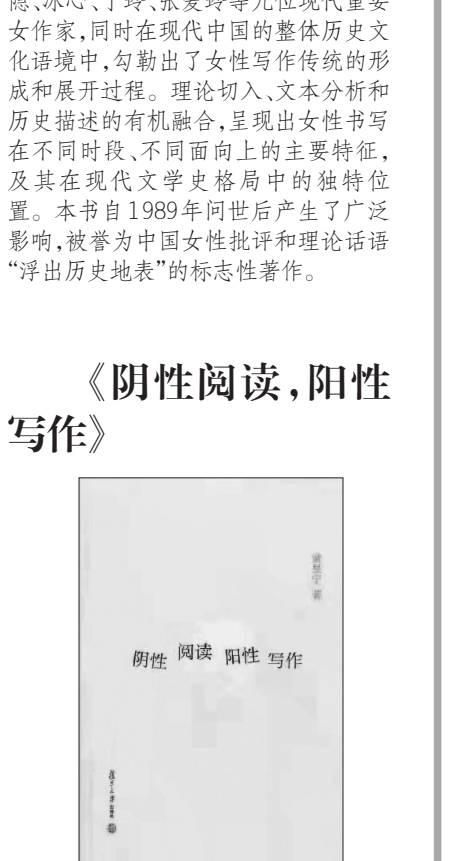
张莉:优秀女性文学作品要有对个体经验的书写挖掘,同时也要有关社会问题、关注他人的方向,这些向度可以同时存在,并不相悖。比如,《生死场》里有个人生命经验,但也有对民族危亡时刻的书写。最近那些受到关注的国外作品,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证言》《那不勒斯四部曲》,既有个人经验,也有社会问题的关注。题材固然重要,但作家的表现力也很重要,文学作品最终要看写得好不好。

女报《新阅读》:您也一直关注着当代女性文学写作,并提出了“新女性写作”的概念,主编了《2019/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等作品集。新女性写作与以往的女性写作新在哪里?

张莉:去年,我开始编选《2019年女性文学年选》,今年是第二年了。这是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尝试。这个年选,每年选出20位女作家写的20个当代女性故事。我希望这些年选排列在一起,既是女性文学的文本,也是一个社会学和妇女研究样本,我们从这里不仅看到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也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生活状态的重大变化。

《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收入了翟永明、林白等13位各个代际、但都深具性别意识的重要女作家的作品。我希望以此推动对“女性写作”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之所以提“新女性写作”这个概念,是想强调今天的“女性写作”与以往的有所不同。它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希望作品将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希望作家对两性关系、男人与女人以及性别意识有深刻认知。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而不是对抗与排斥,我希望以写作专辑的方式来推动一种新的女性写作出现。

张莉:我们很难出现一部全民关注的女性小说或者女性非虚构作品了。一方面今天我们是视觉媒体的时代,文学影响力变小了。另一方面也因为,今天的作家可能对当下的生活没有那么敏感了。今年我组织了一个写作专辑,“非虚构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女性劳动者”,我希望那些大众媒体并不熟悉的女性生活出现在写作者笔下,我想那是当代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的发展方向。特别期待青年一代作家既关注自



己的日常生

己的日常生活,也能关注重要的社会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女性写作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北上广的女性,但其实我们国家幅员辽阔。这些年,我一直关注边地女性的写作,关注那些少数民族女性的写作。我喜欢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马金莲的《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和冯良的《西南边》,喜欢她们书写的女性生活,那是我们不常了解、但是却应该了解的女性生活。关注边地女性,关注我们时代女性生活中的重要变化,我认为是当代女性写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

女报《新阅读》:女性写作如何平衡更能体现女性自身立场的个体经验和更关注充满男性评价标准的社会问题?

张莉:优秀女性文学作品要有对个体经验的书写挖掘,同时也要有关社会问题、关注他人的方向,这些向度可以同时存在,并不相悖。比如,《生死场》里有个人生命经验,但也有对民族危亡时刻的书写。最近那些受到关注的国外作品,比如《82年生的金智英》《证言》《那不勒斯四部曲》,既有个人经验,也有社会问题的关注。题材固然重要,但作家的表现力也很重要,文学作品最终要看写得好不好。

女报《新阅读》:您也一直关注着当代女性文学写作,并提出了“新女性写作”的概念,主编了《2019/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选》《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等作品集。新女性写作与以往的女性写作新在哪里?

张莉:去年,我开始编选《2019年女性文学年选》,今年是第二年了。这是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尝试。这个年选,每年选出20位女作家写的20个当代女性故事。我希望这些年选排列在一起,既是女性文学的文本,也是一个社会学和妇女研究样本,我们从这里不仅看到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也可以看到中国女性生活状态的重大变化。

《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收入了翟永明、林白等13位各个代际、但都深具性别意识的重要女作家的作品。我希望以此推动对“女性写作”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之所以提“新女性写作”这个概念,是想强调今天的“女性写作”与以往的有所不同。它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希望作品将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希望作家对两性关系、男人与女人以及性别意识有深刻认知。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追求的是两性平等和两性理解,而不是对抗与排斥,我希望以写作专辑的方式来推动一种新的女性写作出现。

张莉:我们很难出现一部全民关注的女性小说或者女性非虚构作品了。一方面今天我们是视觉媒体的时代,文学影响力变小了。另一方面也因为,今天的作家可能对当下的生活没有那么敏感了。今年我组织了一个写作专辑,“非虚构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女性劳动者”,我希望那些大众媒体并不熟悉的女性生活出现在写作者笔下,我想那是当代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的发展方向。特别期待青年一代作家既关注自

新书馆

“她们”写了,“她们”还将要写

——读《如何抑止女性写作》

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一书中,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揭开了一段隐匿的历史——男性通过种种策略,阻止、无视并贬低女性的文学写作。在这本反讽意味十足的文学评论中,拉斯戏仿男性口吻,点破了历史上贬损女性作家的惯用潜台词。同时,尖锐的讽刺并未使拉斯失却客观,每一条抑止女性写作的机制分析都有历史文献、文学文本佐证。

事实上,这是拉斯对于男权社会抑止女性写作模式的高度概括。在《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中,拉斯用她熟悉的科幻文学情景打开了一段隐匿的历史——男性通过种种策略,阻止、无视并贬低女性的文学写作。在这本反讽意味十足的文学评论中,拉斯戏仿男性口吻,点破了历史上贬损女性作家的惯用潜台词:“她没有写”“她写了,可是她不该写”“她写了,可你们看看她写的啥呀?”……尖锐的讽刺并未使拉斯失却客观,每一条抑止女性写作的机制分析都有扎实的历史文献、文学文本佐证。这是一本面向男性中心文学史的批判檄文,也是对整个女性文学传统难能可贵的补白。

针对女性写作的“非正式禁令”

在分析抑止女性写作的策略之前,拉斯首先揭示了这些策略的隐性特质:强势的男性当然不会颁布明确的法令禁止女性写作,但“非正式禁令”却处处存在,成为司空见惯的权利剥夺。

女性写作者被赋予的“假性自由”与真实阻力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稍稍熟悉唯物史观的人都知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伴随着父权制的大获全胜,开启了男性在政治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女性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被彻底“他者”化,不掌握财产权,不从事社会生产,也自然不可能具备文学创作所需的物质基础与自由空间。

书中,拉斯援引文学史资料呈现了女性创作者打破禁令的艰难。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女性,都很难有可支配的金钱和闲暇时间:艾米莉·狄金森身无分文,需要向父亲讨要购买书籍的钱;乔治·艾略特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她得料理家务,照顾生命垂危的父亲;工人阶级女作家蒂莉·奥尔森则需要面对一天工作十五小时的干扰……

物质与闲暇的缺失之外,男权社会从意识形态上将女性排挤出文学创作活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本就在20世纪才逐步获得,而“劝阻女性求知”的顽固意识,不断否决着女性写作的正当性,摧毁着女性创作者的信心。

于是,非正式禁令成了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一面剥夺女性创作的可能,一面却又借此宣称她们没有能力创作:“这种让女人不要当创作的啥呀?”……尖锐的讽刺并未使拉斯失却客观,每一条抑止女性写作的机制分析都有扎实的历史文献、文学文本佐证。这是一本面向男性中心文学史的批判檄文,也是对整个女性文学传统难能可贵的补白。

二元对立等式的诸种面孔

面对男性自以为是的“她没有写”的论断,拉斯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驳。的确,女性在狭小艰难的空间中依旧创造出了相当优秀的文学作品,男性便只能转而贬低它们的价值。“剥夺作者身份”“诋毁作者”“内容的双重标准”等都是价值贬损的不同策略。如果我们对拉斯的分析略加思考,便不难发现,这些策略中贯穿着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等式,人与文学创作的特性被归为高低有别的两类,而女性总与劣等的特性相勾连。

“剥夺作者身份”的策略有时将女性作家的作品归功于她的兄弟或身边的其他男性,有时则呈现为隐性剥夺,即认为是“她身体里的那个男人在写作”。“内容的双重标准”更是一连串二元对立的分配,男性将女性逐出公共领域,而后将私人领域定义为琐细的、毫无价值的。于是女性写作也等于狭隘的,等于地方主义的,等于不严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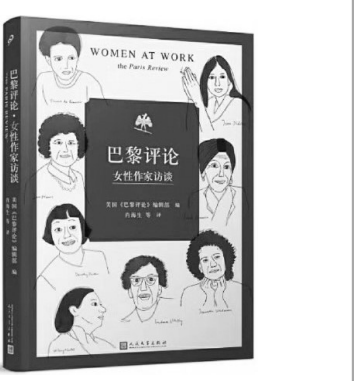
在高下两分的对立体系内,女性写作本身成了对男性特权的冒犯,这使得价值低俗常常演化为诋毁。拉斯谈到,19世纪的欧洲几乎将成功写作的女性等同于道德败坏,到了20世纪,关于女性的道德约束有所松动,但擅长写作的女性又与“缺乏女人味”“不招人喜欢”画上了等号。“女性的智识是要以失去可爱的女性的特征为代价的。”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海伦妮·多伊奇如是说。

“她们”彼此相连

“如果关于前辈的记忆被埋葬,那么过去从

阅快遂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



《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2月版

《女性作家访谈》是《巴黎评论》编辑部自2017年起推出的特辑,迄今为止已出版两辑。此次推出的《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篇目上有所调整,收录了十六位女性作家的访谈。作为《巴黎评论》出版史上第一个女性作家访谈特辑,本书的十六篇访谈可以看作“对话中的散文”,既是极具水准的对写作技术的探讨,又涵盖了女性作家生活中那些细微却折射性格的细节:她何时确立写作的志向?她的文学启蒙是什么?在不同的写作阶段,她遇到的具体阻碍是什么?她如何面对外部否定和自我怀疑?她的同道人或格格不入的对手又是谁?她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关系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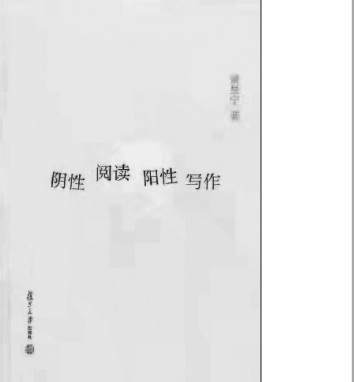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戴锦华/孟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版

本书是系统运用女性主义立场研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的代表性著作。借助精神分析、结构、后结构主义理论,本书以作家论形式深入阐释了庐隐、冰心、丁玲、张爱玲等九位现代重要女作家,同时在现代中国的整体历史文化语境中,勾勒出了女性写作传统的形成和展开过程。理论切入、文本分析和历史描述的有机融合,呈现出女性书写在不同时段、不同面向上的主要特征,及其在现代文学史格局中的独特位置。本书自1989年问世后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誉为中国女性批评和理论话语“浮出历史地表”的标志性著作。

《阴性阅读,阳性写作》



黄宁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

本书揭示了女性写作者承受的“危险”,不只是制度、阶级、经济、历史之类的抽象概念,不只是比男作家高得多的自杀率,而是所有这些因素和现象合成之后掰碎了弥漫在生活细节里的——它们迫使你在下笔时总怀疑有没有忠实于自己的声音,总在怀疑你的风格是否不够女性化或者太过女性化。渐渐地,连女人自己也开始相信,她们的句子是流出而不是吼出的,它们该是缺乏肌肉力度的,该该是精致而匮乏有效营养成分的,该该是斜体的,该该在突然提高音量时变得刺耳。

(言浅 整理)